

長江文明

第六輯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編

- 三峽地區秦漢墓分布與都邑關係初探
- 從出土文物看秦漢三國時期蜀郡工室、工官
- 重慶地區宋代黑釉瓷研究
- 法國遠東學院東巴經藏書書目簡編
- 陶行知創辦育才學校的文化传播意義



河南人民出版社

長江文明

第六輯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长江文明. 第六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215-04839-3

I. ①长… II. ①重… III. ①长江流域—文化史—文集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71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16 印张 8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1500 册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0.00 元

长江文明



第六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

《长江文明》编委会

主 编：王川平

副主编：刘豫川

编 委：柳春鸣 王 玉 张荣祥

胡昌健 唐冶泽

编辑部主任：唐冶泽

责任编辑：艾露露

英文编辑：杨 婧

英文翻译：谭 晓

编 者：张振兴

地 址：重庆市中区人民路236号

目 录

廪君蛮、板楯蛮及其与巴人的关系 杨 勇 (1)

云南古代贮贝器艺术 樊海涛 (7)

三峡地区秦汉墓分布与都邑关系初探 蒋晓春 (19)

从出土文物看秦汉三国时期蜀郡工室、工官

..... 罗开玉 (29)

重庆地区宋代黑釉瓷研究 傅 裕 (40)

法国远东学院东巴经藏书书目简编 和力民 (66)

浅析历史时期云南乡规民约中的环境意识

——以云南现存 1949 年以前的乡规民约石刻为例

..... 刘志伟 (78)

一本关于长江三峡的老照片集 唐冶泽 (87)

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的文化传播意义 孙丹年 (105)

“在远不遗” “泽惠流离”

——云阳张飞庙“感恩碑”由来 唐维华 (117)

2010 长江·三峡古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先秦史学会

第九届年会综述 吴 倩 (121)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读陈丽琼、董小陈《三峡与中国瓷器》

..... 曾海龙 (封三)

(封面图片：云南晋宁石寨山第 10 号墓出土的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

Catalogue

Yang Yong

Linjunman, Bandunm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a People (1)

Fan Haitao

The Art of Ancient Shell-storage Container in Yunnan (7)

Jiang Xiaochun

Studies on Correlations between Tomb Distribution and Capital County
——in the Three Gorges Region (19)

Luo Kaiyu

Research on “Gongshi” and “Gongguan” of Shu Counties from the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Qi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Three Kingdoms (29)

Fu Yu

Research upon the Black Glaze Porcelain of the Song Dynasty in Chongqing (40)

He Limin

A Brief Bibliography of Dongba Scriptures in École Française d’Extreme Orient (66)

Liu Zhiwei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Rooted in the Folk Convention of Yunnan
——Stone Inscription of Folk Convention in Yunnan Prior to 1949 as An Example (78)

Tang Yeze

An Old Photo Album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hree Gorges (87)

Sun Dannia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ce of Yucai School Found by Tao Xingzhi (105)

Tang Weihua

“Never Abandon Despite of Distance. The Favor Always Comes to the Homeless”
——the Origin of “Gratitude Stele” in Zhangfei Temple of Yunyang (117)

Wu Qian

Ancient Culture of Yangtze River and Three Gorges Academic Symposium in 2010
——Review of the Ni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Pre-Qin Dynasty Association (121)

Zeng Hailong

“It’s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Three Gorges and Chinese Proclain* Written by Chen Liqiong&Dong Xiaochen
..... (inside Back Cover)

廪君蛮、板楯蛮及其与巴人的关系

杨 勇¹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710)

提 要：廪君蛮和板楯蛮是战国秦汉时期活动于川东和峡江地区的少数民族，通过梳理文献，并分析考古材料，本文认为他们是战国时的土著巴人，有别于巴的统治阶层即姬姓巴人。另外，廪君蛮和板楯蛮二者的族系、地位及影响力也不同，廪君蛮为战国土著巴人的主体，而板楯蛮于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才开始崛起于川东。

关键词：巴人 廪君蛮 板楯蛮 晚期巴文化

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古国。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趁巴蜀相争之机遣张仪和司马错出兵灭巴蜀。此后，由于秦对蜀和巴采取了不同的统治策略，也因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等多方面的差异，蜀人和蜀文化很快被融合和同化，而巴人和巴文化却得以延续较长一段时期。一般认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所记载的战国秦汉时期活动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巴郡南郡蛮和板楯蛮正是与先秦巴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巴郡南郡蛮因传说其祖先号为廪君而又称廪君蛮，其主要活动于川东和峡江地区，后部分向湘、黔等地流散。板楯蛮主要分布于嘉陵江流域，因其英勇善战且使用一种称作“板楯”的防御器具而得名。关于廪君蛮和板楯蛮，长期以来学者们根据其活动地域以及相关文献记载，或将他们均看作巴人，或视为巴人的两个不同支系，或认为前者为巴，后者属巴境内的一支少数民族。考虑到巴的概念及其具体人群构成的复杂性，有必

要对廪君蛮和板楯蛮及其与巴人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目的是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廪君蛮和板楯蛮的来龙去脉，并有助于对巴人或巴族概念的再认识。

一

由于偏居一隅，正史中有关巴的记载不多，相对而言，对巴记载较为详细的为晋人常璩所撰的《华阳国志》，其中的《巴志》关于早期巴人说：“《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人皇居中州，制八辅。’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在



1. 杨勇，男，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博士。

这里，巴人的世系被纳入中原体系，先为黄帝、高阳之支庶，后为姬姓巴子。“黄帝、高阳之支庶”恐为附会，应是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潮和“华夷共祖”意识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参加武王伐纣一事，《尚书》所记并无巴，存疑。周封宗姬为巴子，结合其他文献记载看，则很可能为史实。《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又记楚共王正妃为“巴姬”，《路史·国名记》记楚灵王之妃亦称“巴姬”，可知巴可能还曾与楚通婚。除此之外，《左传》中更有不少关于春秋时巴与邓、秦、楚、庸等国往来、结盟、战争的记载^[1]。这些史料表明，姬姓巴子国不仅存在，而且春秋时一度较为活跃。

根据有关史迹判断，巴的活动中心最初主要在汉水上游一带。大约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因受楚、秦势力的胁迫，巴逐步退保川东，此后较少参与中原事务，直至最终为秦所灭。故《巴志》载：“鲁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败于鄢。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会盟希。”《巴志》还载：“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2]。此巴国疆域范围较广，估计可能是先秦时期巴曾活动过的地域，而非某一时期的实际领土。原因在于，该地域不仅范围广，而且地形复杂，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巴似乎都不可能同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统治。《巴志》所载“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实也说明巴的统治很不稳固，变数较多，不然统治中心不会如此飘忽不定。

与巴相比，廪君蛮和板楯蛮在文献中出现相对较晚。《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世本》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

姓：巴氏、樊氏、谭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有学者分析廪君五姓最初起源于湖北西部的夷水（今清江流域），后来逐渐向峡江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迁徙^[3]。上条史料还谈到了廪君蛮以白虎为祖先崇拜的问题，唐代樊绰《蛮书》卷十亦载：“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4]故人们一般认为廪君蛮有白虎崇拜的习俗。

关于板楯蛮，《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又载：“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宝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渝水即今嘉陵江，可知板楯蛮主要分布于嘉陵江流域。板楯蛮射虎之事在《巴志》中亦有记载，除射虎者为“胸忍夷人”外，内容与《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相近。此外，《巴志》载：“汉兴，亦从高祖



定乱，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虎为事，户岁出賚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今所谓弼头虎子者也。”又载：“阆中有渝水。賚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可知汉晋时期板楯蛮又称“賚”、“白虎复夷”、“弼头虎子”。

按照这些记载，廪君蛮和板楯蛮都为川东和峡江地区的土著族群，而且板楯蛮见于《巴志》，廪君蛮五姓中又有“巴氏”，可见他们都与先秦的巴有关。但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史迹看，廪君蛮和板楯蛮与先秦的姬姓巴人之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这可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巴的人群构成实际较为复杂。

《巴志》载：“其属有濮、賚、苴、共、奴、獯、夷、蜚之蛮。”賚即板楯蛮。该记载虽未提到廪君蛮，但在以上诸蛮中，有的很可能就和廪君蛮有关，如苴。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葭萌（今四川广元一带）封有苴侯。《史记·张仪列传》载：“苴蜀相攻击。”《索引》：“苴音巴，谓巴蜀之夷自相攻击也。”上个世纪50年代，广元昭化宝轮院发现了一批船棺葬，其文化面貌、内涵与巴县冬笋坝巴人船棺葬基本一致，发掘者认为是一处巴人遗存^[5]。也有学者认为“苴”即“巴”，故又为苴人遗存^[6]。从发掘资料看，宝轮院船棺葬出土的很多青铜兵器上都铸刻有虎纹及其他“巴蜀符号”，可见苴为崇虎之族，似与廪君蛮有关。由此可知，廪君蛮和板楯蛮在战国时即为巴境内的土著族群，与姬姓巴人不是一回事，他们之间是一种属从关系。这就是说，所谓巴人实际包含姬姓巴人和土著巴人两部分，姬姓巴人为统治阶层，其最初为姬姓诸侯，即分封至巴地的周人，土著巴人处于中、下层，可看做巴的属民^[7]，或如有的学者所言，巴国的百姓巴人应当是当地的土著——这是西

周封建的常态^[8]。

要指出的是，这两部分巴人虽因族源、地位不同，而在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但二者同时也有融合的趋势。战国时期的巴同中原各国的关系渐行渐远，其能在川东及峡江地区立国，显然离不开与土著蛮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整合。秦灭巴后，姬姓巴人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除被秦所俘之外，可能还有部分留居原地，逐渐融入当地土著。

土著巴人的情况也较复杂，还需具体分析。从上述记载可知，廪君蛮和板楯蛮在分布、起源、习俗信仰等方面都有差别，应属不同族系。不仅如此，他们的地位及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廪君蛮分布遍及川东及峡江各地，其首姓又称“巴氏”，可见其人多势众，且与姬姓巴人关系较为密切，应当是土著巴人的主体。板楯蛮主要分布于嘉陵江流域，秦灭巴后才崛起于川东，且因杀虎而扬名，有学者推测，所谓秦昭襄王时的白虎之患，实乃秦灭巴后巴人残余势力一次反抗的隐喻，秦招募板楯蛮射杀白虎，实质上就是利用他们镇压巴人（廪君蛮）的叛乱^[9]，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据此，战国时板楯蛮可能是巴国境内的一个小的土著族群，处于从属性的边缘地位。

二

关于巴、廪君蛮和板楯蛮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结合考古材料作进一步的讨论。考古学上的巴文化以战国至汉初的遗存发现较多，一般称为晚期巴文化^[10]，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及其附近地区，重要的如昭化宝轮院、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11]、荣经同心村^[12]、云阳李家坝^[13]、开县余家坝^[14]等地的墓地。晚期巴文化内涵丰富，并显现出较鲜明的地域特色。随葬器物中，圜底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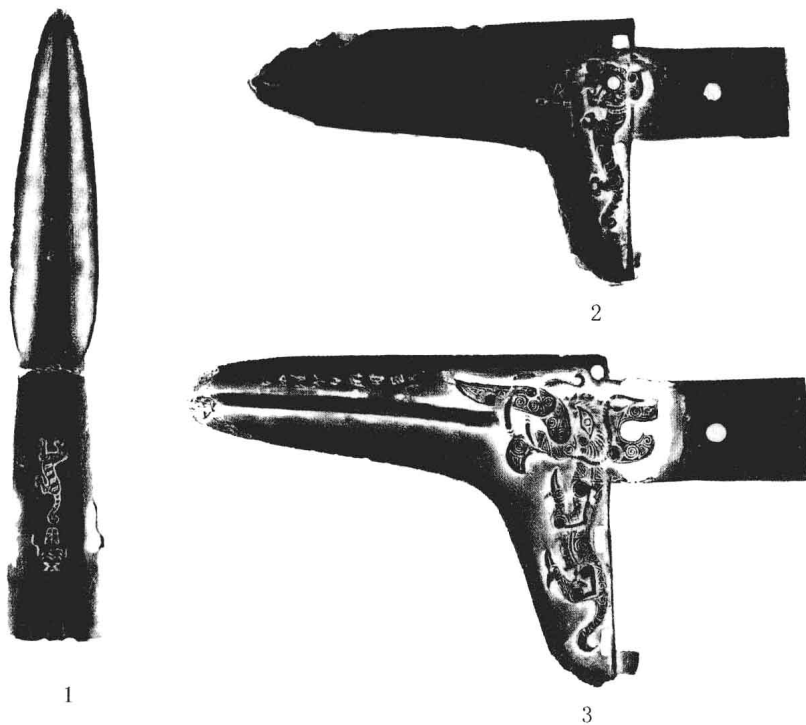
器、圜底铜釜以及柳叶形剑、柳叶形矛、直援戈、束腰弧刃钺等青铜兵器形制都很特别，且组合稳定。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和符号也引人注目，尤其是常见于剑、戈、矛等兵器上的虎纹，制作精致且形象生动，成为晚期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图一）。

晚期巴文化根据其内涵和特征，还可分为不同的类型。这些类型的形成可能与巴人的阶层等级、族群支系等因素有关，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巴人的构成情况。小田溪发掘的巴人墓规格较高，《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枳即涪陵，故一般认为这里是巴的王族墓地。从发现看，巴的王族墓葬使用漆木棺槨葬具，随葬较多铜器，除柳叶形剑、矛等典型的巴式兵器外，还包括很多礼器，如错金编钟、带“王”字的钲、虎钮錡于、鼍（缶）、错银铜壶等。这些与冬笋坝、李家坝等地的巴人墓都有不

同，不仅说明墓主身份等级较高，而且体现了较浓郁的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色彩。这说明，巴的统治阶层——姬姓巴人与土著巴人在族源、文化等方面确有区别，他们在与土著巴人的互动中，文化上既有一定的土著化的趋势，同时又有保持自己姬姓诸侯文化认同的主观意向。以冬笋坝、李家坝等墓地为代表的晚期巴文化遗存主要与当时巴的基层社会有关，其文化面貌较小田溪巴王墓更具地域特色，直接的创造者当为土著巴人。不过，这些土著巴人的文化尤其是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器类上，而且有的器物在形制、纹饰等方面也能溯源至中原，如一些虎纹兵器即可在黄河流域的陕甘等地区找到类似者，其间或有渊源关系^[15]。对小田溪出土的部分巴式青铜兵器的检测分析显示，其合金比例与《考工记》“六齐”之说基本吻合，这从工

艺和技术的角度说明了巴人青铜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总之，作为一支地域青铜文化，晚期巴文化于战国时期在川东和峡江地区的兴起，离不开外部文化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文化实际是当地土著文化与中原等外部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而在此过程中，姬姓巴人的进入和统治无疑是最直接的背景因素。

晚期巴文化遗存中大量出现虎纹非属偶然，这应与文献中廪君蛮以白虎为祖先崇拜的记载有很大关系。虽然我们不能以有



图一 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出土的虎纹青铜兵器拓本

1. 矛 (98YL II M23 : 1) 2. 戈 (98YL II M21 : 6) 3. 戈 (98YL II M25 : 9)
(引自《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图三七, 3、6、7)

无虎纹来判断有关遗存的具体族属，但虎纹遗存的广泛分布，无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廪君蛮在土著巴人中的主体地位，亦即创造晚期巴文化的重要人群。关于板楯蛮的文化面貌如何，除文献所记的一些习俗外，考古学上尚无能确指为板楯蛮的遗存。在嘉陵江支流渠江流域的宣汉罗家坝遗址曾发现一批巴人墓葬，发掘者根据地域判断该支巴人为板楯蛮系统^[16]，但从公布的部分资料看，其文化面貌同李家坝等处的巴人墓葬别无二致，特别是一些青铜兵器上亦见虎纹等巴文化纹饰和符号，因此其更可能与廪君蛮有关。据文献，板楯蛮不仅活动地域限于渝水两岸，而且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习俗，如专事射虎、使用木板盾牌等，但在目前已发现的晚期巴文化遗存中，似乎还难以找出能与板楯蛮这些习俗相联系的文化因素。

要之，从考古材料看，晚期巴文化遗存主要与姬姓巴人和廪君蛮有关，板楯蛮对该青铜文化的形成似乎影响不大。

三

综上所述，板楯蛮和廪君蛮是两个不同

的族群，其文化、信仰多有不同，虽然他们都与古代的巴国有关，但两者的地位和影响力是不同的。廪君蛮是战国时期巴国土著人群的主体，也是晚期巴文化主要创造者，板楯蛮则是巴国境内一支处于边缘地位的小族群。这种情形至秦灭巴后发生了变化，由于秦在巴地拉拢和利用板楯蛮，同时对与姬姓巴人关系密切且实力较强的廪君蛮采取打击和镇压的措施，并对之推行移民政策（荣经等原蜀地发现的战国晚期巴人墓地很可能就与被迫迁徙异地的廪君蛮有关），导致廪君蛮的势力很快遭到瓦解，而板楯蛮的大姓集团组织得以长期保持，并一直活跃在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

正是在这种“此起彼伏”、“今非昔比”的历史变迁中，巴人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巴境内的社会结构、族群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变迁过程。如果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动态地看待巴及巴人的概念，包括廪君蛮与板楯蛮的关系等问题，我们对许多关于巴人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将难以理解和运用。



注 释：

[1] 如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邓南鄙鄢人攻而夺之币，杀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鄢章让于邓，邓人弗受。夏，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鄢。邓养甥、聘甥帅师郁鄢，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邓人逐之，背巴师而夹攻之。邓师大败，鄢人宵溃。”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闾敖尹之。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闾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文公十六年：“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

[2] 鱼复即今奉节，夔道位于今宜宾东境，汉代为今汉水流域，黔涪为今渝、鄂、湘、黔几省市邻近地区的乌江、彭水流域。

[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2~20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4]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

[5]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6] 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剑的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7] 段渝：《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

[8] 许倬云：《试说巴蜀》，《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第155～156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

[10] 杨勇：《略论晚期巴文化的几个问题》，《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庆祝佟柱臣先生八十五华诞学术文集》，文物出版社，2006年。

[11]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文物》1974年第5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涪陵市小田溪9号墓发掘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同心村巴蜀墓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四川荣经县同心村巴蜀墓的清理》，《考古》1996年第7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荣经严道古城遗址博物馆：《荣经县同心村巴蜀船棺葬发掘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3] 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4—1995年四川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四川大学考

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14] 山东大学考古系：《四川开县余家坝战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1期；山东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化局、开县文物管理所：《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

[15] 杨勇：《试论巴蜀文化虎纹戈的类型和族属》，《四川文物》2003年第2期。

[1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达州地区文物管理所、宣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2003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9期。



Linjunman, Bandunma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Ba People

Yang Yo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10)

Abstract: Linjunman (廪君蛮) and Bandunman (板楯蛮) were two minorities which located in east Sichuan Province and the Three Gorges area in the Qin-Han period. Through analyzing ancient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se two minorities were aboriginal Ba (巴) people and were not akin to Ba people who belong to Ji (姬) cl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addition,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Linjunman and Bandunman were different in ancient time, the former was main body of aboriginal Ba people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a State, the latter began to be influential only from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Qin-Han period.

Key words: Ba people, Linjunman, Bandunman, the later period of Ba Culture

云南古代贮贝器艺术

樊海涛¹

(云南省博物馆 云南昆明 650032)

提 要：贮贝器是滇青铜文化的独特代表，它在滇国的地位与中原的“鼎”有些类似，标志着拥有者高贵的身份与地位。贮贝器出现后，逐渐取代铜鼓成为滇国“重器”。它器盖上规模宏大的立体雕塑装饰代表着云南青铜器失蜡法铸造的最高成就，它们具体入微地再现了滇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重大事件，堪称“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

关键词：云南 贮贝器 滇国 艺术

一、贮贝器的起源与分类

贮贝器是青铜铸造的，用以贮藏海贝的容器。它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目前仅出土于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官渡羊甫头四地。石寨山等地是滇国统治的核心区域，所有的贮贝器均出土于大型墓葬中，它们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

贮贝器的出现，以大量海贝的出现为前提，而大量海贝的出现，是滇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历史必然。滇池、抚仙湖区域青铜文化墓葬中发现的大量海贝显然已经具备了货币的基本职能——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以往的学者常以滇国平民墓葬中未发现海贝为论据，来否定滇国海贝的货币职能，但近年来金莲山滇国古墓群的小墓中，我们发现了以海贝随葬的现象（图一）。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海贝不是作为装饰品分布于死者头部或衣服部位，而是集中成一小堆放置在死者的腰间，说明它们已经脱离了装



图一 金莲山出土小孩尸骨腰部海贝

饰品的范畴，具有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可能。从另一层面考虑，即使海贝仅仅只由滇国的王侯贵族所拥有，在他们之间也存在交换的可能，我们虽不能完全赞同滇国海贝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它作为一种“特殊货币”是成立的。从更广义的角度看，云南与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很早之前就已经展开，滇国出土的海贝可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国际货币”的职能。鉴于古代交通条件之艰难，所以滇国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货币流

1. 樊海涛，男，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通速度相对较慢，这也是贮贝器出现的客观前提之一。考古发现的贮贝器中，大多盛贝，少数中空，空腹者是缘于无贝可贮，可能其中的海贝正处于流通过程中。

迄今云南出土的贮贝器已超过 90 件（包括铜鼓等代用品），年代最早的贮贝器出土于江川李家山，该遗址第 21 号墓中出土的木柄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C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625—550 年^[1]。即春秋中晚期。云南地处高原，放射性碳素测定结果略有偏早，但可以肯定最迟在战国时期，云南已经出现了贮贝器。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是云南青铜贮贝器发展的高峰，汉武帝开滇之后（公元前 119 年），贮贝器在云南逐渐没落，西汉晚期迅速消失在历史烟云中。贮贝器的盛衰与滇王的政治命运相联结^[2]。随着汉文化的深入，滇王失去了统治滇国的权力，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被“大一统”，贮贝器也未能幸免。

贮贝器可分为桶形、鼓形、异形三大类。

桶形贮贝器可分为直腹和束腰两型。直腹桶形贮贝器形如提桶，器壁竖直，圈足或三足、四足，贯耳，也有虎耳者，子母口

盖。有的器盖上有立体雕塑装饰（图二）。桶形器是岭南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越南东山文化中也多见^[3]，岭南地区多作为食器或酒器，而在越南用来收敛尸骨，天子庙出土的三件桶形贮贝器显然是受其影响。

束腰筒形贮贝器形制为束腰，贯耳或虎耳，子母口盖，盖上常有立体雕塑装饰，底有三足或四足（图三）。“束腰”让人想起“楚王好细腰”的典故，虎耳也常让人联想起楚文化中升鼎的爬兽形鼎耳。滇、楚文化的相似或许不仅仅只是出于偶然。束腰造型亭亭玉立，它变化多端的外廓线与青铜器的沉稳大气形成强烈对比，厚重沧桑中别具轻盈灵秀之美，李伟卿先生认为它可能是源于竹器^[4]。

鼓形贮贝器数量最多，型式复杂。有将铜鼓却置作为贮贝器使用的，也有专为贮贝而生产的倒置鼓形贮贝器。以往学者未注意两者区别，用铜鼓倒置代用或是用铜鼓改造者，鼓腰纹饰亦为倒置，而一些专门铸造的倒置鼓形贮贝器，鼓腰纹饰正常。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鼓形贮贝器就是用铜鼓改造而成，将一铜鼓倒置，在铜鼓的“鼓足”上加一圆盖，盖上一长方形小孔以投贝，出土



图二 桶形贮贝器



图三 束腰筒形贮贝器

时候鼓面向上，器盖向下放置，其中盛满海贝。这种改制品略显粗糙。专门铸造的倒置鼓形贮贝器纹饰精美，工艺水平极高，出土时候“鼓足”向上，最典型的的就是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上仓贮贝器”，其形制如铜鼓倒置，子母口，器盖圆形，微微上凸，中央有一圆孔及两长方形孔可投贝，周围饰放牧图，器身为上仓图，纹饰精美，内容丰富，是滇国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较常见的鼓形贮贝器是将一铜鼓去鼓面，下加一底，上加一圆盘形器盖的造型，有的圆盘形器盖上还留一直径为4~5厘米的小孔以投贝（图四）。其他还有叠鼓形贮贝器，分两式：一式为两鼓上下相叠，下鼓加一底，去鼓面，上鼓去鼓面，加一器盖，再将两鼓焊铸成一体。此式叠鼓形贮贝器仅见于晋宁石寨山，共三件。另一式为两铜鼓一反一正，上下相扣合的叠鼓形式，下鼓鼓面下另加三足，仅发现一件，出土于江川李家山。

异形贮贝器仅有两件，一件是石寨山出土的“洗形贮贝器”，它由三足架、铜洗、战争场面圆形器盖组成，三者尺寸、形式搭配均不伦不类，是临时拼凑而成。另一件是七牛锥形顶贮贝器，形制与滇青铜器中的铜

线盒近似，但盖为锥形顶，上有一圆形小孔可供投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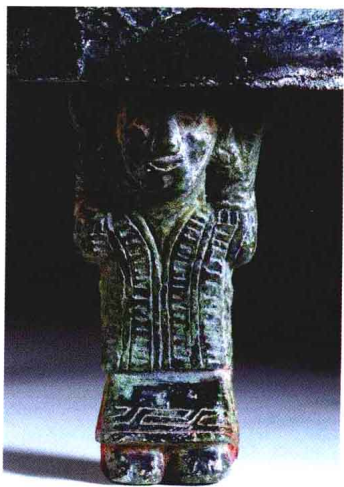
二、贮贝器的装饰布局与装饰工艺

贮贝器是一种青铜容器，它的装饰布局不外乎器足、器身、器耳、器盖几部分。

器足与器耳以实用为主，变化不大。器足从方形扁足、圆形短柱足向虎爪状矮兽足演变后，一直很稳定，几无装饰。因为贮贝器器足较矮，常被器身遮盖，从可视角度来说也无装饰的必要。唯一例外的一件是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虎鹿牛贮贝器，该器为束腰筒状，器盖中央雕铸一峰牛，沿边绕雕一虎、三鹿；器身刻几何纹、鸟、兽纹各一周，三器足为踞跪人形，以头颅与双手承托器身，构思奇特，彰显出器主人无上的权威（图五）。器耳的发展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早期的一些贮贝器无器耳，后出现贯耳、桥形耳，小耳多，大耳少。当立体装饰出现后，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双虎耳。虎的造型有大小肥瘦之别，从早期的略显呆板逐渐进步，演变成张口咆哮，长尾下垂作奔跑状的生动形态。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的老虎塑造得特别生动，或神态威凛，虎视眈眈，或动态十足，富有活力。其他还有蛙



图四 鼓形贮贝器



图五 虎鹿牛贮贝器的人形器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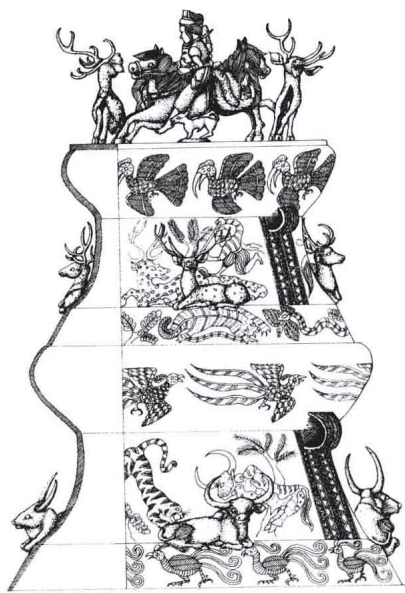
图六 用来固定器盖与器身的铜鼓形插销

形、豹形、牛形器耳，但不多见。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为四虎耳，器身两耳，器盖上也有两耳，两两相对时就可以将器盖与器身卡牢，这种器耳除审美价值外，还有很强的实用性。贮贝器看似结构简单，但许多设计都别具匠心，如器盖与器身的对合，有的贮贝器器盖有一缺口，只有正好与器身凸起的一小三角形图案对合时能将器盖盖上。有的器盖上的立体雕塑下方有长连杆下插到器身的一个暗扣中，当器盖盖好后，旋转立雕使连杆与器身扣紧，即使倒置也不会使器盖脱落（图六）。

器身与器盖是贮贝器装饰的重点。器身最大，可以容纳更多内容，滇人常用点纹、线纹、云雷纹、锯齿纹等几何纹样或断或续，构成装饰图案的“画框”，然后再在其中填充不同的内容，如赶牛、上仓、舞蹈等。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来源于铜鼓艺术的借用，因为贮贝器器身不像铜鼓那样完全遵循“纵向分格”，所以它所能描绘的场景比铜鼓更为广阔复杂。在鼓形贮贝器的器身装饰上，滇人在鼓腰下方还焊铸立体的犀鸟、卧牛、卧鹿、盘蛇等为装饰，这是鼓形贮贝器的独创。它改变了铜鼓鼓腰平面装饰的束缚，使鼓形贮贝器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值得一提的是两鼓正向相叠的叠鼓形贮贝器，

它不是对铜鼓的简单借用。叠鼓形状不仅使它具有更大的容量可供贮贝，在审美上也给人以新的享受。铜鼓玲珑曲折的外廓线从两次曲折增加为四次曲折，下鼓略大，上鼓略小的搭配使视觉重心异常稳定，宏大的体量充满了崇高的美感，体现出王者的尊严（图七）。现知的这种两鼓正向相叠的叠鼓形贮贝器均出自晋宁石寨山大型墓葬中，数量仅3件，它很可能是滇王的专利。

对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上面上演的剧本都经过精心构思，表演者有人物，也有动物。动物题材最常见的是立牛，其他动物形象还有虎、鹿、猴、兔、狗、飞鸟等。人物形象常与墓主生前活动有关，包括战争、祭祀、生产生活场景。主角一般形象高大，表面鎏金，标志出与众不同的地位，有单独的骑士、有狩猎的贵族、还有肩舆上的妇女等。人物最多的一件贮贝器“诅盟贮贝器”的盖上竟多达127人（图八、图九）。这件贮贝器盖通过立体雕塑，用细致入微的写实手法描绘出滇国真实的社会生活，不仅具有艺术的感人力量，还



图七 叠鼓形贮贝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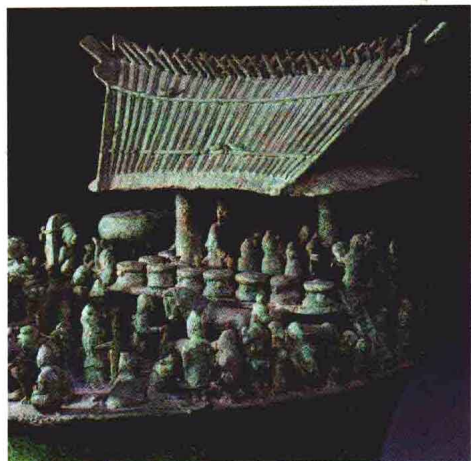
图八 诅盟贮贝器

是滇国的“无字史书”，堪称滇青铜艺术的巅峰作品。

贮贝器器身由范铸而成，器盖上的立体雕塑则多用失蜡法，一些立牛、虎耳或用失蜡法或用范铸，没有固定的程式。器身与器耳的连接有的采用分铸法，也有焊铸连接，器盖上的立体雕塑与器盖的连接方式多数采用焊铸连接。比较特殊的一件是石寨山第6号墓出土的一件叠鼓形战争场面贮贝器，器盖上的人物与器盖的连接是先铸好器盖上的人物、动物立体雕塑，然后用单面范铸造器盖，在器盖将冷未冷时候，将事先铸好的人物、动物立体雕塑插在器盖上，等器盖完全冷却后就形成牢固的连接。这种方式属于一种省工的取巧，可能和当时滇王政治势力的下降有关。

贮贝器铸造完成后主要采用的装饰工艺有：鎏金、镀锡、线刻、髹漆。

与扣饰等小件器物通体鎏金不同，贮贝器上的鎏金工艺仅施于人物身上，而且一件器盖上无论人物多寡，鎏金者仅一人，其体量在众多人物雕塑中也最大，坐骑或肩舆等均不鎏金。鎏金人物应该就是墓主生前形象的写照。滇人这种突出重点的表现方式，是为了强化滇国王侯贵族的特殊身份。



图九 诅盟贮贝器器盖立体雕塑（局部）

镀锡工艺主要施于器身。曾有学者提出滇青铜器器表的锡层是由于青铜溶液中的锡在冷却时偏析形成的，但近年来科技考古实验证明滇青铜器表的锡层是经过镀锡处理^[5]。镀锡既可以防止锈蚀，又具有很好的装饰性。试想，新铸成的贮贝器，银白色的器身上、器盖中央的鎏金人物金光闪闪，光彩夺目，单从视觉上就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线刻工艺是用尖锐的钢质工具在青铜器表镂刻细致的花纹、图案。由于线条纤细，只有近距离才能观赏，所以线刻图案常常作为一种“背景”，起到烘托、补充主题的作用。线刻属于特种工艺，虽然在镂刻前可能有“粉本”，但一般线条都自然流畅，很少有时断时续的稚拙感。它对工匠的技术水平、艺术修养都有很高要求，普及性不大，所以凡有线刻工艺装饰的贮贝器，都精美异常。

髹漆工艺仅在1951年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形“杀人祭柱贮贝器”上出现过。该器器身腰部用线刻工艺镂刻了8个姿态各异的男子，手持棍棒、弓箭等做奔跑状（图十）。之所以要在其上髹漆，可能是因为线刻图案在银白色的器身上对比度小，不够明显，工匠就在镂刻后用黑漆进行髹饰，使画面更清晰、美观。



三、贮贝器的平面装饰

在立体装饰成熟前，平面装饰一直是贮贝器艺术的主要装饰方式。平面装饰受贮贝器形制约束较多，并且与青铜冶铸工艺水平密切相关。平面装饰一种为范铸，另一种是铸造完成后直接在器表镂刻而成。范铸纹饰有阴纹、阳纹、阴阳纹结合几种，多数纹饰为阴阳纹结合，即用凹陷的大块面构成图案的基本轮廓，然后在局部用凸起的线条描绘细节，如眼睛、衣纹等（图十一）。阴阳纹结合的方式使平面图案具有了“虚实”关系，比起单独使用一种线条更具艺术表现力。范铸纹饰虽然是平面，但滇人已经开始有意识的采用各种方式来表现空间观念，李伟卿先生称其为“有条件的遮断法”，即在前物遮断后物时，尽量避免损害后物的完整性^[6]。这一手法的出现在云南绘画艺术的发展史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范铸纹饰是在模范上先刻绘好图案然后合范浇铸成，刻绘前必然有“设计图”，在确定主题后，选择画面、经营位置、表达情节等步骤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这点看，滇国的青铜冶铸工匠当中，已经有了很高明的“画家”。

线刻图案在贮贝器铸好后再在器表刻绘，线条均为阴纹，比范铸线条纤细得多，刻绘的内容也更细腻生动。范铸图案“笔

触”遒劲，利于表现主题，线刻图案线条柔弱，多用来“补白”。例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狩猎场面叠鼓形贮贝器”，器盖表现的是滇国骑士与随从猎鹿的场面，器身镂刻骑士猎鹿、猎猪场面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如犀鸟、凤凰、鹰、虎、牛、狼、兔、猎犬、蟒蛇、蜈蚣和一些不知名的兽类、昆虫。动物们或作奔跑状，或在相互搏斗，身前身后还刻绘了一些树木作为“活动背景”，引人入胜。在这里，线刻图案并不是“主题”，它只是用来陪衬器盖上鎏金骑士的高大威武形象。

贮贝器的平面装饰，主要施于器盖与器身。器盖多为正圆形，无论如何演变都未脱离“圆心定点”的基本布局，它们与铜鼓的鼓面装饰布局很相似，以“光体”、“晕圈”构成圆形装饰面，区别在于铜鼓是乐器，其艺术装饰必须服从于功能需求，而贮贝器的圆形器盖无击打的必要，可以做更多的“变化”。以石寨山第12号墓出土的一件铜鼓形贮贝器为例：该器器盖由圆心向外分为三个环形区域。正中间第一区是一直径为4.8厘米的圆形“投贝孔”，孔外有复线三角齿纹一周。第二区中描绘有九人，其中有三人各捧一高足有流器；一人立于一大铜釜旁，持长柄勺从釜中舀液体（或为醪糟）盛于旁跪



图十 杀人祭柱贮贝器腰部线刻纹饰（局部）



图十一 贮贝器盖上阴阳纹结合表现的“放牧图”